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

冯友兰自传



我名友兰，字芝生，汉族。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县。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后来就在唐河祁仪镇落户，成为地主。我的父亲于1898年中了清朝戊戌科的进士，后来在湖北做过知县。

我于1895年12月4日(公历)生于祁仪镇。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读书。1910年到开封入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1915年毕业。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我的专业。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逻辑学。当时懂得逻辑的人很少。教师教我们读耶芳斯作的《逻辑学纲要》。这本书的内容他也没有全懂，只把他当成一本英文读本，教我们念英文。我就是自己摸索，并且照着书后面所附的练习题，自己练习。这当然不

能使我完全懂得书的内容,但是我对于逻辑发生了深厚的兴趣,由此进一步发生了对于哲学的兴趣。

我认为逻辑学是哲学的入门,至少对于西方哲学是如此。有些人认为形式逻辑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三段论法的推理谁不会?有人还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对立的。这些都是对于形式逻辑的误解。

无论如何,我对于哲学的兴趣是逻辑引起的。我对于哲学的入门,是逻辑引导的。以后我没有专门学逻辑,但是我对于逻辑的一知半解,帮助了我学哲学。

逻辑学引起了我对于哲学的兴趣,这个兴趣当然引导我喜欢西方哲学。当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据说1915年就要开西洋哲学门。当时我很高兴。可是入学以后,才知道西洋哲学门又开不成了。因为原来打算聘请的那位教授死了。在图书馆里有一书架英文书和德文书,据说是那位教授的遗物。就是这一架外文书,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关于宗教的。我没有办法,只得进了中国哲学门。

但是三年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三年的学习使我知道,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东西之外,即专就中国方面说,也还有真正的学问。况且时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在当时,北大的情况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种“风”所给我的感染也是很大的。总的说,这三年中,我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基本功。

我于1918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在开封,我同朋友们办了一个刊物,名《心声》,宣传新文化。我也是“五四”时代的人;可是没有参加1919年“五四”那一天的运动,

也没有看见那一天的盛况。一直到七、八月间,我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才看见了一些那一天的遗迹,听说了一些故事。

留学考试通过了,但因船期耽搁,12月才到纽约,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作研究生。这才有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三年毕业,我作了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三年学习的成绩。

这篇论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发表,题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来我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两章是我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列入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我在二十年代的主要著作。

我回国以后,本来想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史,作一些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工作。当时的燕京大学叫我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中国哲学。我在燕京讲,又在清华讲,多年积累,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于1933年出齐。以后有朋友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这是我在三十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

我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

这六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了什么困难,受到了什么阻碍,感到了什么痛苦,才会有的。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上,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崖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当时的狂风,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新理学》这部书应该题为第一章“总纲”。所以新理学这个名字，在我用起来，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南岳、蒙自所写的，商务印书馆 1939 年所出的那部书。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以下用不同的符号表明这个区别。以《新理学》表明前者，以“新理学”表明后者。

当时写这六部书，并不是预先有个计划。只是遇到些问题或遇到有些地方组稿而随时写的。可是毕竟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又好像是有一预定计划，预写的大纲。那是因为写这些东西时，有一个总的目的，总的动力，那就是抗战。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序文说：“此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要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这里所说的“重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反思。

《新原人》的《自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序文》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

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份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我作的（见注）。歌词调寄《满江红》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日本投降了。在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也是我作的。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接着说：“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

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嶮。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这就是“贞下起元”。

日本投降后,原来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的那位美国朋友,写信来说:他现在美国费城本薛文尼大学当教授。那个大学邀请我去当一年客座教授,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同他合作,完成他的翻译工作。1946年暑假,我随同清华回到北京,完成了七年的心愿。随即从北京到费城。因为给学生上课,我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我于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但没有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

国哲学之精神》。

在西方,研究古代文化的,有希腊学,埃及学等。研究中国文化的称为“中国学”。这些学都是把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来研究,这也难怪。因为在解放以前,外国学者来中国的,中国也无非是让他们看看长城,逛逛故宫。除了这一类古的东西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看。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先搞好。我想到王粲的《登楼赋》中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

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我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到十二月清华就先北京城而解放了。在清华解放的前夕,南京派人来,邀赴南京,我坚决拒绝。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解放以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革命和建设的热潮空前高涨,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

另一种情况更加强了我在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搞了几年,总算是写了一部份《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受了极大的摧残。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又被别有用心地重视起来,来了一个假繁荣。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这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摧残。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和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是写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

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作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著作。

《新事论》的最后一篇题为《赞中华》。其最后一段说：“真正的中国人已造成过去的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当时我没有怀疑，现在没有怀疑，将来也是不会有怀疑的。

附录

曾得学位：

| | |
|----------------|-------|
| 北京大学毕业 | 1918年 |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 1924年 |
| 美国普林西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 1947年 |
| 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 1952年 |

冯友兰主要著作目录

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

2. 《人生哲学》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
3. 《中国哲学史》一至二册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3
4. 上书英文译本(“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5. 《新理学》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9
6. 《新事论》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0
7. 《新世训》 开明书店 1940
8. 《新原人》 商务印书馆 1943
9. 《新原道》 商务印书馆 1944
10. 上书英文译本(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gan Paul London 1947
11. 《新知言》 商务印书馆 1946
12.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小史》) Macmillan New York 1948
13. 《中国哲学史新编》一至二册 人民出版社 1962—1964
14. 《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一至二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1962
15. 《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曾任职务

| | |
|----------------------|-----------|
| 中州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 1923—1925 |
| 广东大学哲学教授 | 1925 |
| 燕京大学哲学教授 | 1926—1928 |
|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 | 1928—1952 |
| 清华大学秘书长 | 1928 |
|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兼校务会议代主席) | 1929—1952 |
| 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 1939—1946 |
| 美国本薛文尼大学客座教授 | 1946—1947 |
| 美国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 1947 |
| 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主席 | 1948 |
|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 1949 |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1952 至今 |
|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 | |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涌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填词)

第二、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注：

今年四月底，清华大学举行校庆时，也举行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曾经在联大的师生庆祝集会上，唱校歌，情况热烈。有人给找着了一张油印的联大校歌，上面写着“罗庸词”。还有张清常先生所作的《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其中有校歌，也是写“罗庸词”。这同我记忆不符。经我反复回忆，又追查联大的档案，我认为我找出了不符的原因。

在联大制定校歌的时候，组织了一个校歌校训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联大常委会指定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罗庸先生、罗常培先生和我五个人为委员，我为召集人。在开第一次委员会的时候，要推出一个人执笔起草。大家都互相推让，最后决定由召集人起草。我起了一个草，就是现在的那首《满江红》词。第二次开会，我提出草稿，请提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于是就通过，送交常委会。我写了一个给常委会的报告信，把所通过的校歌送去。报告信是我写的，我就把我的名字签在最后一行，其余的委员都亲笔签名。罗庸先生的名字，恰好签在第一行。（这个报告的原件，联大收入档案。在档案中的那个原件，还附有我亲笔写的校歌稿。）常委会通过这个校歌，等曲谱作成后，油印发给学生，让他们练唱。大概负责这个工作的人，见信中没有说明谁是作者，只见罗庸先生的名字写在第一行，就以为他是作者，于是写上“罗庸词”。现在所发现的那张油印的校歌，可能就是当时发给学生练唱用的。张清常先生作《进行曲》时，就以此为底本，编入《进行曲》中。当时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张先生的《进行曲》的连词曲谱，也是最近才见到。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碑文是我作的，由罗庸先生写在石碑上，闻一多先生篆额。这三项任务，都照传统惯例在碑上写明。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背后的土山上。